生命世界的辩证法

——基于行动元理论解读《老人与海》

董 赟 余 虹

【摘 要】从行动元理论解读《老人与海》，发现这篇小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作品主题，蕴藏着对生命存在的三个维度思考，即个人总是置身于竞生、依生、共生的生命世界中。老渔夫和鱼之间是主体与客体的竞生关系，陆地与老渔夫之间是社会与个人的依生关系，大海与男孩之间是自然与人类的共生关系。这三个维度、三组关系交织一体，呈现出生命的丰富与赓续的精彩；而这正是《老人与海》所展示的生命世界的辩证法。

【关键词】行动元 生命世界 辩证法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是一部典型的海明威式硬汉小说。教材截取老渔夫勇斗鲨鱼群却最终失败的精彩一幕，集中表达了“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作品主题。

如何深入探析这一基本主题？以往的研究常常聚焦主人公老渔夫圣地亚哥，剖析他顽强的生命意志、旺盛的生命力量与永不言败的生命精神。但老渔夫形象展现的个体生命尊严，仅仅是作品主题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海明威曾以“冰山”为喻：“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1］这个广为人知的“冰山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去探索冰山在海面之下的部分，才能瞻望整座冰山的雄伟壮观。因此，只有探索老渔夫形象所关联的生命世界之深广阔大，才能触摸作品主题的整体面貌。

结构主义理论家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为人们提供剖解《老人与海》这座巍峨冰山的新鲜方法。行动元理论以“对位”原则将作品中承担行动功能的因素归纳为“行动元”（actants），并将作品读解为一个充满张力的行动元结构。格雷马斯所谓的行动元，包括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六个基本类型；这六个行动元既承担着不同的行动功能和意义，也因相互间的张力形成三组“对位”关系：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2］

《老人与海》中不仅存在这三组对位关系，还展现了每组对位关系包含的深刻辩证关系：老渔夫和鱼之间是主动与被动的辩证关系，陆地与老渔夫之间是社会与个体的辩证关系，大海与男孩之间是自然与人类的辩证关系。以上三者，既将《老人与海》蕴含的生命世界之竞生、依生、共生的辩证法剖解出来，也将作品主题“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三个维度呈现在眼前。

一、竞生：主体与客体的辩证

竞生，意味着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激发、显现与确证蕴含在主体与他者对抗竞争之中。在“竞生”意义上，海明威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表达的正是“生命不息，竞生不止”。

主体与客体是叙事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组行动元。主体作为行动的执行者，是作品的主人公；客体则是主体追寻的对象或目标。一般而言，主体是行动中的主动性力量，客体则是被动性存在，主体依靠战胜或据有客体而取得意义。在《老人与海》中，作为主体的老渔夫与作为客体的“鱼”之间，却并非固定的主动/被动关系，而是动态的相互对抗、相互竞争、相互激发的辩证关系。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老渔夫，消瘦憔悴、皱纹褐斑，手上满是生活留下的伤疤，他已经84天没有捕到一条鱼。显然，他不是一个强健的英雄，但身体衰朽没能遮盖老渔夫充盈的生命热情，眼睛始终“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3］。老渔夫的名字“Santiago”，是西班牙语“San Jacobo”的缩写，意为“圣雅各”。“圣雅各”是耶稣最早在加利利湖所收的四门徒之一，他既是一位渔夫，也是《圣经》记载的第一位殉道者。海明威这里的妙笔安排，暗示捕鱼行动正是“老圣地亚哥”确认自身、获得生命意义的方式。老圣地亚哥日复一日划着平底小帆船往来海上的艰辛，既是渔夫与海鱼之间自然的竞争对抗，又饱含老渔夫渴求捕获海鱼、确证自身的心意，从而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生命力量。也正因如此，老圣地亚哥的渔夫形象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衰朽肉体与强盛精神间的辩证性张力。

要深刻理解这种张力，还须探析老渔夫意欲捕获的“海鱼”。从行动元理论来看，大马林鱼是老渔夫希望获得之物，是老圣地亚哥确证自身生命的“工具”；作为与主人公老渔夫“对位”的客体，海鱼是被动性存在。需要指出的是，大马林鱼本是大海中的自在生灵，并非被动性的死物，它与人类亦无必然的关涉。在老渔夫的捕鱼行动中，它必然全力对抗被捕捉，从而显出其庞大、庄重与崇高的品质。大马林鱼偏离被动性的独立性，让老渔夫陷入矛盾心态：既将大马林鱼视作必须捕杀的客体猎物，又将它与人类、与自身相提并论，甚至“比我们高尚，有能耐”，觉得“它是我的兄弟”。大马林鱼的强大、机灵、镇静、美丽，以致使它反“客”为“主”，让老渔夫感到一种共情而来的伤心与被动：老圣地亚哥既“替这条没东西吃的大鱼感到伤心”，又感慨“我爱你，非常尊敬你”“但愿我就是这条鱼”。［4］大马林鱼越是在与老渔夫的对抗中展示出它的生命力量，就越激发老渔夫的斗志。于是，渔夫老圣地亚哥对大马林鱼的追捕行动转化为一场生命力的“炫耀”或“献演”。

可见，《老人与海》中铺设了一种极具张力的主体—客体关系：“老渔夫”与主体主动性、“海鱼”与客体被动性，不是静态的固化规定，而是一种动态的辩证性张力。在捕鱼行动中老圣地亚哥已不是简单满足物质之需，“海鱼”亦不单是被“老渔夫”捕捉的客体物；老渔夫与海鱼，或者老圣地亚哥与大马林鱼，都是生命世界的构成部分，两者都遵循生命世界的辩证法，在相互竞生中确证自身。因此，《老人与海》的故事向读者宣告：可能失败，甚至可能毁灭，却始终不能遮掩生命的熠熠光辉！

二、依生：社会与个体的辩证

众所周知，个体与社会相互依存共生；这种“依生”关系，使得个体生命活动，不能脱离社会孤存。因此，老圣地亚哥捕鱼行动中还包含着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从行动元理论来看，主体对客体的追寻总是归于一定的原因。这一原因被格雷马斯界定为行动的“发送者”，行动“接受者”则接受“发送者”发送的目标。格雷马斯指出，行动发送者可能是具体人物，但常常是某种抽象力量；行动接受者则往往是行动主体。据此而言，老渔夫圣地亚哥作为“接受者”，其捕鱼行动的“发送者”正是其生活的“陆地”所象征的社会性力量。

海洋是海鱼的栖息地，陆地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空间。建基于陆地的人类社会矗立在海岸上，与野生状态的海洋形成对位。人类在陆地社会中生活、交往，享受人类文明带来的便利，自然生成一种生命的安全感与自在感。作为社会个体的老渔夫圣地亚哥，海岸上有他休憩的小屋、喜欢的球队，有聚会饮酒的露台饭店、一大清早就营业的小吃馆，还有朋友和孩子们。—— 陆地社会生活是他生命倚重的重要部分。

海明威如是描述渔夫们捕鱼后回到陆地的活动：“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两端各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组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以备腌制。” ［5］通过描述人类对海洋生灵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处置，海明威将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关系的嬗变，尤其是现代社会对大自然的无度索取，表现得既含蓄且况味复杂，使得渔夫捕鱼的行动晕染了多重社会性因素。

随着现代社会观念日益浸染，老渔夫圣地亚哥敏感地觉察到海港的变化，及其对自己生活的微妙挤压。报纸上全美棒球赛的消息，广播的赛马和博彩结果，特别是顺海风吹来的鲨鱼加工厂的鱼腥味，似乎都变成了声声催促：快去捕鱼！但老圣地亚哥次次捕鱼无获，使他本已被挤向角落的窝棚和小帆船，连小偷都不再光顾。这种情况下，老圣地亚哥不断出海的迫切，不仅来自海港社会的压力，还有对海港社会现状的某种不满。他常常梦回自己年轻时的水手生涯，这正映照着老渔夫真实内心：生命在于海洋冒险的激情，而不是留停陆地社会的安逸。因此，面对海港人们的玩笑、排斥，抑或同情，老圣地亚哥的乐观与坚持，都在诉说：出海捕鱼才是渔夫真正的生命享受！由此可知，陆地社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一正一反地向老渔夫施加了捕鱼行动的动力。

应该说，发送者与接受者，这组对位的行动元关系，揭示出个体与社会间的深刻辩证关系。“老人”与“海”的故事，不是一则个人英雄主义寓言；海明威所言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硬汉精神，在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上告诉人们：只要老圣地亚哥还生活在海港，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就不能败给海洋；老渔夫远海捕大鱼的冒险，不单是个体生命力的确证，更是个体与社会“依生”关系的彰显。

三、共生：自然与人类的辩证

人类与自然之间辩证的共生关系，是《老人与海》作品主题的深层含义之一。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共生共存，构成一个整体的生命世界；即使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也昭显生命世界的生生不息。

“老人”与“海”组成的生命世界，从格雷马斯行动元理论来看，反对者与辅助者是一组对位的行动元，即主体行动的阻力和助力。辅助者助力主体达成目标，反对者则阻挠主体取得成功。在《老人与海》中，大海作为反对者，代表着阻碍老渔夫捕获大鱼的力量；小男孩玛诺林等人为老渔夫孤身捕鱼提供帮助，是为辅助者。值得注意的是，大海与男孩这组行动元并非单纯对立而是意义深远的共生关系。

大海是性质复杂的反对者。年轻渔夫总向大海索取，从大海得来“鲨鱼肝卖了好多钱后置备了汽艇”。他们称呼大海“el mar”，将它视为“男性”的“竞争者”“敌人”。因此，对看重金钱的年轻渔夫来说，大海是捕鱼的实实在在的“反对者”。而老渔夫则“抱着好感”地称大海为“la mar”，将它看作“仁慈”“任性”的“女人”；捕鱼成功与否取决于“她”是否愿意给人以恩惠。［6］因此，与其说老渔夫将捕鱼中的风浪、鲨鱼、空手而归当成“大海”的阻挠，不如说捕鱼是“老渔夫”（老人）与另一方“生命”（海）的一场共舞。这场生命之舞，海明威描写得淋漓尽致且特具魅力。老渔夫在深海上对海鸟、海龟、海鱼、水母、浮游生物等海洋生命真诚而复杂的情感心态，让读者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捕获大马林鱼的艰难和与鲨鱼群激烈搏斗应有的危险，结果大马林鱼、老渔夫、鲨鱼群在风浪中进行了一场生命力的精彩展示。即使在生机勃勃的大海面前败下阵来，但老渔夫并不怪罪大海，而只是自责“出海太远了”［7］。这既有老渔夫对“生命海洋”的敬畏，也透出他对自己贪取的反思。

小男孩玛诺林是个特殊的“辅助者”。实际上，“辅助”老渔夫捕鱼的人有帮他看管捕鱼家什的佩德里科、经常无偿给他提供食物的露台饭店老板、担心他出现意外的海岸警卫队等，小男孩玛诺林却很是特殊。一方面，小男孩并非理想的辅助者，他力量弱小，没有完全的行事意志；并且他与老渔夫是既非血缘、亦非师徒的松散关系。因此，当老渔夫多日未有捕获，小男孩就只能退出“辅助”，实际上小男孩只是一个“缺场”的“辅助者”。另一方面，老渔夫又将小男孩当作精神“在场”的同行者，在捕鱼中不时想起小男孩，以他来鼓舞斗志。事实上，这一老一小间的生命续传，早已悄然发生在小男孩照料、慰藉和信任老渔夫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因此，在远海捕鱼这场老人与海洋自然生命的共舞当中，小男孩作为“老渔夫”或人类生命力的延续也隐现其中。所以，当带着被鲨鱼啃食、只剩白色脊骨与巨大尾巴的马林鱼返回陆地时，老渔夫不仅在海洋生命处印证了“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生命本心，而且获得了小男孩的生命认同—— 成为像“老渔夫”一样的“人”。由此，小男孩成了老渔夫捕鱼最理想的“辅助者”，也是老渔夫生命的同行者与理想的后继者。至此，海明威使人相信，肉体的衰弱与竞争的失败对个人而言是难以避免的，但大海生命的丰富与老人—男孩生命的赓续，昭示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绵延不绝的共生关系。

总之，作为海明威花费一生时间写就的作品，《老人与海》“涵容了现实世界和一个人的精神的所有纬度”［8］。而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为解读这部小说提供了新鲜视角，其中两两对位的三组行动元关系，扣住了三个关键维度，勾勒出作品艺术世界的整体面貌，即人生活在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世界，竞生、依生、共生正是这个生命世界的辩证法。这也是海明威“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硬汉精神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董衡巽，选编 . 海明威谈创作［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

［2］格雷马斯 . 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M］. 吴泓渺，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44-257.

［3］［4］［5］［6］［7］ 海明威 . 老人与海［M］. 吴劳，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50-71，3-4，24，116.

［8］海明威 . 海明威书信集：下［M］. 杨旭光，袁文星，译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 ：763.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610068）

［《中学语文教学》2024年第5期］